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玉树临风

杨匡汉选集

杨匡汉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玉树临风

杨匡汉选集

杨匡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树临风：杨匡汉选集 / 杨匡汉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10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1辑)

ISBN 978-7-5360-6609-0

I. ①玉… II. ①杨…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13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桦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875

字 数 29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自序

时间有时是令人太多缺憾的流逝，岁月悠悠，留不下值得回味的篇章。时间有时又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静默，脚印浅浅，无奈于困惑与追求中的沉思。研析与书写，因之也成为一次次对于播种与念想的坚持。

难忘那些镜子与烛火之夜。镜子对我有一种“分身术”：既照出一个有尘世欲望的我，在平凡生活中挣扎的我；也照出一个理性的我，寻觅智慧的我，与繁琐生活拉开距离的我。于是，在摇曳的烛光里，我希望自己不至于被苦难压垮、被庶务挤垮，多多少少从超然的角度，站到历史的、文化的和审美的立场，去领略和思考一些应当关注的问题。如果不带着问题去思索，文学研究对于自己是无效劳作。

我也难忘曾经居住过的海边的小屋。从窗口看去，每天的日月都是新的。从这里眺望，大海的波浪一波接着一波，海上的路，由银白的、雪白的、层层叠叠的浪花所铺成。海上的灯塔，曾经点亮了多少文化夜行者的心路，温暖过多少文学漂泊者的情怀。海内与海外的华文作者，就有了更多心灵的和鸣，就会回应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上的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是风雨故人来”。

《选集》所辑的文字，大致归为三类：一是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之“引桥”的台港澳地区文学的观察；二是若干文学个案的研析；三是华文文学知识命题的考辩。我不擅长就作品谈作品的鉴赏，即使面对

作品，也勉力在“不可承受之轻”的羽毛上找出些问题，提出点想法。观今日之人文研究，大致有“学者”式、“才子”式、“依附”式、“追踪”式、“玩一把”式、“思想者”式、“哲学家”式等等不同方式。“正路”和“野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只要不走邪路就好。我们都在路上。就自己而言，只是要求能在研习中注入些许学术的因素，如问题意识、独立思考、小心求证、智性快乐、诗意表述，等等。区区愚衷，未知泥上鸿爪，复有一加顾视之价值否。刊而布之，属意析理居正，唯问耕耘乎。

2012年7月

目 录

自序 1

唐山流寓话巢痕

——论台湾当代文学的中国人文精神 1

此岸与彼岸的通航（两则） 25

飞鸟犹知恋故林

——论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母题 36

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

——重读梁实秋美文 54

旅雁上云归紫塞

——论叶维廉的诗创造 62

寻求点燃整个民族的心火

——海峡两岸文学比较导论 72

现代主义在两岸 86

玉树临风

——我观世界华文文学 125

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

——在澳门笔会的讲演 131

赤道边上的韵林

——马华诗歌的精神投向及艺术呈现 139

文化的驿站 152

学术语境中的香港文学研究 168

哥白尼的天体与文学家的天望 186

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 191

同一母题的文本变奏 208

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 22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62

双重边缘性与母性的声音 269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 285

生命美学 299

附录

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反思

——杨匡汉研究员访谈录 320

杨匡汉学术年表 333

后记 336

唐山流寓话巢痕

——论台湾当代文学的中国人文精神

—

在文学研究中，遗神取貌，极易产生懵懂不审的批评错位。当我们把目光投入台湾省当代文学的观察时，倘若只求面相的特异而斩根断源，就可能助长那种盲目崇洋，今有敝帚享之千金、古有璞玉湮没莫闻的流风；同样，如果单从表层的题材范围和语言效果去模拟传统格式，那么，此类因循与回归，也同中国文学的精神相悖，而且往往使学识的平庸与才气的拮据得到某种事先给定的庇护。这两种情状，实际上达成如是合谋：拒绝深入传统，拒绝深入对于文学作品所必具的智慧、思想、情感浓度、独创性、使命感、人格因素等等精神性内涵及其创造性表现的探究。

曾经为科学史事业奋斗一生的美国学者乔治·萨顿指出：“艺术史对我们的帮助，首先是了解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作品具有一个高于人类精神其他表现形式的巨大优越性；给予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和综合的景象；为我们提供只消看一眼就能把握的知识，把过去再现于生活之中。”^①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不管它实践何种理论主张或采取何种创作路数，凡有生命力的，都会

^① [美]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中译本，第37页，商务印书馆，1987。

把“过去”再现于“今天”之中，都会让“当代”反复“发现”和重新“生成”那些似乎消失了的人类智慧与文明精神，也都会以新的冲动、激情和选择，为人们提供脉络可寻的价值、经验、规范和知识的综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当代如恒河沙数的相当驳杂的文学作品中，如果经过比较严格的淘洗，对那些够上水准的篇章进行历史的、美学的和辩证的审视汇通，就不难发现，为一批优秀作家所严肃探索，由一批优秀作品所创造构成的文学格局，其核心，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承续与流播。我们民族高次元的人文传统，游动如岚地流在作家精神历史的深处，成为血素、骨髓和气质；怀有真诚、良知和艺术追求的作家，带着他们的才情与活力，取舍与发现，执拗与困惑，乃至失误与教训，参与了和传统的互动关系，力图通过基因的重组或镶嵌，创获新的语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今天所包容。

应当指出，那种台湾省当今文坛上堪称“暗潮”的分离主义观点，那种类似“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的情绪化呼号，是有害的，既不符合历史，也有碍于中国文学整合的趋势。台湾文化——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化——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据李亦园教授考证：“一般论及两岸关系史，都以明末汉族移居为起点，实际上五万年前的史前时代，直到有史记载，大陆居民曾有三迁台：一、‘长滨文化’的主人，距今五万年。二、第二批则是现代高山族祖先，距今六千五百年前，最迟约二千至二千五百年前。三、第三批是近代汉族移民，这一次移民又可分为南宋、明末及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九年总计三拨的移入。”^① 相随汉族移民而进入台岛的中原文化，作为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的总和，自然地、也历史地成为台湾地区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的基因。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在漫漫长路上，为台湾地区的文学开启山林，注入风韵，使之融入中国文学博大渊深的传统之中。丘逢甲有诗云：“唐山

流寓话巢痕，潮惠漳尔齿最繁；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① 流寓可辨巢痕，寄生已植深根。中国人文传统规范着台湾地区文化——文学的民族本位和对母体文化的承续，也生成和延伸着兼具历史命运与原乡风情的本土形态。从近代到当代，绝大多数台湾省作家都不赞成“分离”论。新文学家张我军在20年代曾说：“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② 新生代作家林耀德确认：“我对祖国的认同基于一桩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是一个使用汉字创作的作者。汉字流通所及，形成了一个超越历史、种族、国境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区域有其独特的地区性现实和地区性文化形态，以不同的特质参与、丰富了整体。”^③

分离只能造成悲剧，而且将意味着一种正常的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死亡。

把台湾文学置于中国文化——文学的总格局中，置于汉藏语系系统中研究考察，超越无休止的、有时也并无益处的互相纠缠和弹赞不一，我们会对同一母体衍生的根本性文学课题，获得更多的共识。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如何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存活和发展，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该是需要我们持续发掘的。因为正如诗人叶维廉所云：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④

不过，在展开这一论题之前，有必需要注意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的

① 丘逢甲：《台湾竹枝词》。

② 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卷1号（1925年1月1日）

③ 林耀德：《一个台湾作者的赘语》（1991年3月），载《台港文学选刊》，1991（5）。

④ 叶维廉：《赋格》，见诗集《愁渡》，台北，晨钟出版社，1962。

区别。人文主义（humanism）是西方运用的特定概念。按照辞典赋予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运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人文主义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①简言之，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价值，属于一种人本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而人文精神，其时间向度和空间容量，比前者要深长丰厚得多。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是以往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知行相资的履践方式的聚集与提升，人的宇宙观念、人生信仰、意识、心态、伦理道德、价值尺度和行为规范，民族的智慧与魂魄，文化的积淀与精义，都一一融会其间。作为生活的反映和文化的传达，人文精神总是投影于文学创作之中，但它不是一种标杆或附加物，而是流贯于作品中、为作家所崇尚的恩情追求和精神向往，是一种兼具文化经纶和延展色泽的心灵相交与秀韵佳境，是一种空谷足音——从遥远的地方反射回来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回声，以及可资后人倾听的沉钟响鼓。

中国的人文精神代代传承而历经兴革。中国文化作为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最具人间性、最强调人间秩序的文化^②，萌芽了商周的礼乐之盛，勃兴于春秋的人文世界。孔孟老庄以其互补的智慧追寻天人相与之境，呈现崇本息末的人格与情性。汉代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之高蹈。魏晋有轻名教而贵自然的情感飞扬。大唐以充实为美，以有容乃大、辉及世界的文化，显示其中含坚质、鼎包翠碧的气度。宋明

① 参见《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7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余英时：《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实业公司，1980。

理学立人极之精神，辟出由人文世界通天心天理的修养之路。清代以整理国故重构已往人文世界的图像。及至现代，民主与科学并进，重群体与重个性相辅，又使中国人文精神感应时代脉搏而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有两重性。那些封建的伦理道德、特权思想，那些德力分离、重“学”轻“术”的不良倾向，那些因循守旧、崇拜圣人思路的后喻性和闭关锁国等心态，则是负面的糟粕。然而，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不息地跃动的，诸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行准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以及“欲之太和”的审美境界等等，都是人文传统的精华。中国又是泱泱诗国。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莫不“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人们也通过它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去更深刻地理解其内容和形式。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渗透，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民族、艺术的灵魂。在一件真正的文学作品中，人文精神的精华表现得越充分，越深邃，越见其穿透力和向上力，其艺术价值就越高。

二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台湾当代文学如何呈现中国人文精神的实际讨论。

伊格尔顿指出：“历史变化就是系统内固定元素之间逐渐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排列：没有任何事物的消失，它们仅仅由于改变了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而改变了形状。”^①伊氏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不完整。“传统”作为一个系统有其固定的元素，但继承不是被动的、自在的守

^① [英]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第12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恒，而是意义的重新“生成”；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某些系统异质的元素也会楔入此系统，经过重新变构而得以丰富，也强化了“传统”中某些真理性的本质因素。台湾当代文学景观证明，尽管千姿百态几近杂多，但夕秀虽振，难忘朝华——在那些耐读的、感性和知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系列历史元素的稳定与流变，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并未消失而得以传承，得以重新组合和排列，而且成为创新的酵母。

在我看来，如下的一些“历史模子”，把台湾当代文学置于中国人文精神必然的历史情境中。举凡有价值的文学创作（作家与文本），也在这种拥抱中，获取新的激情、感悟、自由和灵感。

（一）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

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元素。中国历来有进取精神的文人，往往以探求历代得失兴亡之理、穷格物致知之源为己任，笔端凝聚有强烈的忧国之痛和感时之哀。司马迁有由“忧”生“文”的名言：“夫《诗》、《书》隐隐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旧事，思来者。”^①当代学者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以翔实的博引论证了如下观点：“若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但是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②中国历代经典性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属悲愤愁怨之作，即使在那些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也常常横卧

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钱钟书：《诗可以怨》，参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着民族亘古的苦难和感时忧国的思情。

“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此“郁”与“愤”，就是屈原讲的坎壈不平。这一人文精神也深获台湾省许多优秀作家之心。从这块美丽而充满忧患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学，一起始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明显的悲怆色彩。从明郑时的悲歌追怀，乙末后的海天孤愤，到近四十年来的感时伤怀，不少作家将沉重的忧患与苦恼，注入自己的艺术创造中。白先勇认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①经验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作家要出大作品，需要经过大忧患。

速朽的是轻松浮薄而缺乏沉痛与厚重感的作品，真正不朽的，总是经历患难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以及为心血和泪水所浸泡的、“大写”的篇章。

就台湾当代文学而言，这类包含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的作品，大体上映现了三种苦难的精神历程。一是以异族统治（1895—1945）下台湾民众的命运际遇为历史内容，表现中华民族精神话语对日本殖民霸权的抗争之声。吴浊流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中提出“孤儿意识”的命题，以精神上的剧痛表现对民族存亡的焦虑；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以陆氏家族五代人的爱国抗日斗争为主线，全景式地凸现沦陷半个世纪的恩怨血泪，有屈辱中的尊严，有民族大义的磅礴；李乔的《寒夜三部曲》，有强烈的与台湾人民生存命题相关的思情追求，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又一曲悲歌。这些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忧患的经验世界，情感重心置于救亡图存，一切个人的苦难

^① 白先勇：《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

都融入民族的苦难中，小忧患为大忧患所包容，因而更多地具备共相性的精神特征。二是在政治的高压专制（光复后至 80 年代初）的环境下，表现寻找精神的通道以谋求思想自由的骚动之音。应当说，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战斗文艺”并非真文学，不过是为台湾极权的执政党建立“新秩序”而助威的一种笨拙的意识形态宣传罢了。真正显示文学实绩的，有林海音、孟瑤、琦君等怀乡思亲的“乡愁文学”；有白先勇的《台北人》等感喟命运盛衰、反思人世荣枯、悲悼逝去年华的“回首文学”；有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痖弦的《深渊》、王文兴的《家变》等怀疑生存的荒谬，探索精神危机的“现代主义文学”；有陈映真的《夜行货车》、王禎和的《嫁妆一牛车》、黄春明的《锣》等关注城乡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寻觅救赎之道的“本土小说”；还有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等忧患于文化认同陷入困境，忧患于去国者漂泊失根的“流浪文学”等等。这些作品呈示繁复的面相，其精神特征的喧哗性，反映了被压抑的心灵，在通过多种渠道发泄其郁结之意。三是面对意识形态的消费社会的双重钳制，自 80 年代中期以至今日，表现为对社会、历史、身世充满扭曲进行文化批判的不平之鸣。在“追新”、“反叛”、“求异”的三军联盟中，出现了黄凡“镜子”式的《东区连环泡》，张大春“悖论”型的《公寓导游》，宋泽莱“梦魇”般的《废墟台湾》，李昂“血淋淋”的《杀夫》等等。在一个充满“善意谎言”的文化和“异化力量”的社会里，真诚的作家忍受灵肉分裂的痛苦，承担着文化批判的责任，以坚守人性完整和精神人格的家园，营造一片心灵的绿洲。这些作品中体现的精神特征的回跃性，看来是为坍塌的人文精神寻求新的支点，那也是出自忧患而希望获得超越的一种争取。

上述三种贯穿着忧患意识的精神历程，其本质是压抑与自由的矛盾对立。不自由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求，从社会到个人，不能不使感时忧国的作家承受精神上的重负，自我分裂化作内心深深的焦灼，进而从忧患中追寻超越忧患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生长于特殊人文环境中的台湾当代文学，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为什么注重关

怀时世、忧患人生、五内俱摧的情感真实，又为什么不在乎忧伤而爆发着击打现实的力量。

（二）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

台湾山川奇秀，波峰浪谷，动植飞潜，乃天然之诗境文界。历来文鸣不已，扬风挖雅，一如雨润南北。它像祖国各地一样，由于“中国人生既求文学化，文学亦求人生化”，故而作家们重视人与自然的亲和，人与环境的谐调，尽性尽情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中庸》）。人之于天地，心有所感，意有所通，洒洒乎身心自运，荡荡乎神思飞扬，精神生命也为之充实。

“天人合一”反映了中国人文精神中特有的宇宙本体哲学。

西方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从外在设定人与自然的互相对立，人的心灵以探求或控制自然的兴趣为导引。现代的存在主义强调人作为主体的绝对性，也从外面的立场反对科学的心灵。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富有内在性，人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乃至与鬼神合其凶吉。由于天与人均被视为生生不已的生命，所以强调文化——文学不能和自然相阻隔，人文生命不但不应与自然生命相背，而且要丰富自然生命。

承续这种精神，生命情调给予台湾当代文学、特别是散文艺术以深度和灵魂。余光中以追光蹑影之笔，抒写通天尽人之怀：“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让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①有“菩萨心肠，魔鬼文章”之誉的张晓风，以涵天负地为背景，对生命的思考可谓深情独钟：“在补天的石头群里，主角是那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中多出的一块，天长日久，竟成了通灵宝玉，注定要来人间历经一场情劫。他的对方

^① 余光中：《逍遥游》（1964年8月），散文集《逍遥游》，台湾，文星出版社，1965。

是那似曾相识的绛珠仙草。那玉，是男子的象征，是对于整个石器时代的怀古；那草，是女子的标记，是对榛榛莽莽洪荒森林的思忆……是一种不安，一种需索，是不知所从的缠绵，是最快乐时的凄凉，是完满之际的缺憾，是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的惴惴，是想挽住整个春光留下所有桃花的贪心，是大彻大悟与大眷恋之间的摆动。”^①王鼎钧在土遁中澄怀观道，遂得神品境界：“不但人是尘土造的，国家也是。在那复归于尘土的日子，我和土争辩，土，埋葬过多少忠骨丹心的土，埋葬了多少春闺梦里人的土，你还不可以埋葬我，我还要看你，赞美你，在你上面滴许多血汗和踏无数脚印。我还想堆你成山，塑你成家，烧你成器。我还想化合你成金，分解你成空，朦胧你成诗。”^②台湾当今作家毕竟是现代人，也因之而用现代人的心灵去感受旋转的时空，去体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异，以知性提升感性。许达然面对山川风云，发出生命的浩叹：“我们的生命已呆滞了。我们曾在风雨中成熟，台风抬不走；在散沙上挺拔，盐分碱不死。奈何过去我们积蓄的坚忍竟受不了这样迷蒙的现在。我们木麻黄从不麻木，却遭到科学废气的折磨，逼迫我们麻木而黄。我们曾是会生长的篱笆，但现在什么都不如；因为我们已枯。”^③显然，作家注目现代社会里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裂痕，函沉思于尺素，表现了于不和谐中求和谐，建立高科技与高情感之间的平衡的精神向往。这该是今人追求“天人合一”时共通的现代文化心理。

看来，台湾作家钟情于自然与人谐和的俏蓝之色，但并不排拒人世间的风暴。从自然生命到艺术生命因之而显示其庄严。我们不妨重新读解陈映真的成名作《将军族》。小说以温婉凄楚的笔墨，描写了

① 张晓风：《玉想·石器时代的怀古》，见台北《联合报》副刊1985年1月3日。

② 王鼎钧：《失明》，《左心房漩涡》，第36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90。

③ 许达然：《防风林》，《行人道》，台北，新地出版社，1985。